

夏商周考古学研究

杜金鹏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臺灣國史研究

第 11 卷 第 1 期

夏商周考古学研究

杜金鹏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关于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合集。作者依据考古学资料,运用考古类型学的分析方法,结合历史学和相关文献,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文化、都城与宫殿制度、三代文明与社会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中重点对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安阳殷墟等遗址及夏、商文化进行了分析探讨。文中的不少论题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前沿或热点课题,若干学术观点为作者所首发。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以及文物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等学科的研究者、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商周考古学研究 / 杜金鹏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03-019298-1

I. 夏… II. 杜… III. ①夏文化(考古) - 研究 ②商周考古 - 研究
IV. K87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9543 号

责任编辑: 雷 英 / 责任校对: 宋玲玲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50

印数: 1—1 200 字数: 1 171 000

定价: 1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前 言

1982年我自山东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已有2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25年可谓不短——我从青年跨入中年，而今已是半百之辈。回首走过的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历程，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必当有益。鉴此，我将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一些短文结集成册，借此对以往的学习研究做个回顾、清理和反思。

自大学毕业以来，我是地地道道的“挖土匠”，是吃国家俸禄的“农民”。1982年至1995年，我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1996年以来，则在偃师商城从事考古发掘。挥动铁铲，挖掘，挖掘，挖掘，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把我的青春，播撒在嵩山脚下，伊洛河畔。二里头、偃师商城，成了我最为钟情、使用最频繁的两个专有名词。二里头、偃师商城，是我考古研究的家园，我在这里耕耘，在这里收获。我的不少感悟，均得自于这里的田野发掘。

回首我的考古经历，实在不够丰富多彩。我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参加过泗水尹家城遗址、荏平南陈遗址的发掘，参加了在泰安、兖州一带古代瓷窑遗址的调查。我到北京后，除参加北京琉璃河遗址短期发掘之外，就扎根在河南了。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干就是14年，出息不大，但乐此不疲。1994年，以领队身份独立主持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工作。1996年，领导动员我去偃师商城任考古队长，我服从组织调动，但声明只干5年。2002年，践约辞去偃师商城考古队长的职务，淡出田野一线，转向考古报告的编撰。2003年，殷墟孝民屯遗址的发掘，虽然我是组织者之一，却基本上没有在现场参加过发掘。即便如此，由于我所工作过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都是夏商都城遗址，是考古工作者向往的重点遗址，因此，我在这里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虽然是我的科研基地，但在我发表的文稿中，与此无涉者亦占相当比例。大致而言，我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翻检本书目录，读者会发现：直接研究二里头遗址的文章不多。对此现象，稍作解释：我在二里头遗址工作了14年，几乎每年都参与二里头考古发掘，署名发表的考古发掘简报却只有三篇——一篇报道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一篇报道二里头Ⅲ区发掘收获，一篇报道二里头Ⅵ区墓葬发掘收获。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寡淡的成果清单，而我早期在发表文章方面，也有意回避二里头遗址，尽量不直接接触二里头遗址。但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又确实是我日常研究的基点，故有朋友打趣

说我“善于打外围战”，其实，此举实属无奈。我在调离二里头之后，执笔《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有关夏文化的章节，开始放笔去写二里头文化，虽然不够精深，终归有机会体现我在二里头遗址多年的工作经历。现在，我方才可以放手写点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研究文章。

本文集所收论文，依其内容性质可分作四类：一，关于考古学方法论和学科建设的讨论，姑且狗尾续貂，可缀于“考古学理论方法”之末。二，古器物研究，在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透过出土文物窥探古代社会。三，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研究，这是主体性的考古学讨论。四，夏商宫殿专题研究。

从研究思路、目的、对象归类，这些文稿又可以分作如下几组：

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研究室，根据要求，需提交“学科前沿报告”。《夏商周考古学论要》就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改写的，主要包括夏商周考古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当前学科前沿与重大问题研究、本研究室在本学科的学术地位与主要成就以及学科发展设想等内容。

《夏文化内涵特征疑问》、《“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郑亳说”四论据辨析》是针对在考古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说“郑亳说”提出的辩难，其中关于方法论的讨论是核心问题。《“偃师商城界标说”解析》、《夏商分界研究中“都城界定法”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夏商界标研究几个问题的讨论》，是我接受“偃师商城的始建为夏商界标说”之后，就夏商界标问题所做的学术思考与辩论。关于考古学意义与价值的讨论，还有《甲骨文·殷墟·古史观》。同类文章《中国新史学的助推器——考古学》、《考古学与传统古史观》没有收入本书中。

以上是对于学科贡献和学科建设、学派理论的探讨。

《夏商文化断代新探》、《关于山西境内夏文化辨析》、《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广汉三星堆出土商代铜牌浅说》、《安徽出土两件铜斝的年代及其意义》等，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系列文章，同组文章还有本文未收录的《关于夏桀奔南巢的考古学探索及其意义》、《关于“越为禹后说”的考古学探析》、《试论夏商之际的民族迁徙与融合》等。这是我试图在二里头遗址之外，寻找夏文化研究途径的一些摸索，也就是所谓“外围战”。把重要考古学现象与古代文献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是一件非常必要也是非常不易的工作，我把二里头文化在其第二、三期之际突然发生的从中原向周围地区的大规模文化迁播，与商汤伐夏桀造成夏人的四散迁徙，联系起来，从而认为夏商文化分界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说是有其道理的。这是我支持“二里头西亳说”所做的努力之一。尽管后来因为采纳了“偃师商城的始建为夏商界标说”，认为商文化的上限应是二里头第四期，但是至今我仍对当年的探索感到高兴。《试论夏文化探索》本是《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的有关章节，在该书出版前抽出应急。《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

现与研究》是为《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配写的前言，就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提出“新砦文化”的命名，认为如果抛开原先人为划定，单从文化面貌（主要指陶器）分析，可将所谓“新砦期”遗存与原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合并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这是我对早期夏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渊源的一点看法。以上是关于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文章。

自偃师商城发现之初，我便关注其考古进展，并认真思考研究。这里选择的8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对于偃师商城研究的主要收获。重点讨论的是偃师商城的文化内涵、文化分期、年代、性质、意义等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偃师商城与太甲桐宫刍议》从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角度，对“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提出异议；《试论偃师东北隅考古新收获》就首次以确凿地层关系卡定偃师商城大城始建年代、偃师商城发现双轮车辙印的学术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试论偃师商城小城的几个问题》主要讨论偃师商城小城的发现对于城址之布局和年代之认识的意义和价值；《偃师商城年代与分期研究》、《偃师商城与夏商周断代工程》，阐述了偃师商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主要任务、工作项目和经历、重要学术贡献等；《偃师商城第八号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在分析该宫殿基址的结构与布局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八号宫殿为寝殿、偃师商城具有“前朝后寝”宫室制度之观点；《试论商代早期王宫池苑考古发现》以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考古发现为例，讨论早商王宫池苑的规模形制及其产生的背景，指出偃师商城宫城内池渠遗迹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帝王池苑遗存，它的出现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偃师商城近年考古工作要览》是对1996年以来偃师商城科研工作的简单总结，对于其工作思路、工作项目、主要收获、学术意义、遗址保护等，给予了系统介绍。

《关于南亳说与北亳说的前途问题》，主要着眼于商汤都邑地望的探索，主张先商之亳与早商之亳非属一地、一邑，认为灭夏之前商汤曾转战今鲁西南和豫东地区的历史传说，不可轻易抹杀。《郑州南关外下层文化渊源及其相关问题》、《郑州南关外中层文化遗存再认识》、《试论江西商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与商代燕国》、《关于郑州商城始建年代问题》、《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是关于商文化的一组论文，讨论的问题虽然都是商文化，但各自的写作目的却并不相同。

关于古代酒具的研究，计有《陶爵研究》、《封顶盃研究》、《商周铜爵研究》三篇，这是从1987年开始的课题，当时还没有使用电脑检索和写作，完全是手工作业，翻检资料，制作卡片，描绘线图，工作量非常繁重，为了这组文章，前后花费了三年多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封顶盃研究》于1994年获得首届全国青年优秀社科论文奖，《商周铜爵研究》则于1996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1997年又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这组文章是我在考古学器物研究方面的尝试。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内容，而酒器则是古代礼制的

主要载体。因此，我的古器物研究是从古代酒器入手的。

《略论新干商墓玉、铜神像的几个问题》、《试论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的玉冠饰》，加上没有收入本书的《论临朐朱封龙山文化玉冠饰及相关问题》、《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这是一组关于玉、铜神像研究的姊妹篇，并由此引出了《良渚神祇与祭坛》、《说皇》，由器物进而涉及文化与文明，试图“见物思人”，通过无生命的器物去窥视活生生的人及其社会。《中国龙，华夏魂》是我2005年提交给“中国偃师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该论文对于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文物”进行了讨论，将新近出土于宫殿区的绿松石镶嵌龙，命名为“中国龙”。这些是关于宗教考古方面的探讨。

2002年以来，我的研究重点是夏商都城和宫殿建筑，并发表了多篇论文。这是我的一个研究专题，计划从龙山文化晚期一直下延到西周，就三代都城与宫殿做个有点系统性的研究。这里收录的《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再认识》、《偃师二里头遗址四号宫殿基址研究》、《偃师二里头遗址都邑制度研究》、《偃师二里头夏都规划探论》、《盘龙城商代宫殿基址讨论》、《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殷墟宫殿区建筑布局和性质简论》、《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的发掘与研究综述》、《殷墟乙一基址及其相关问题》、《殷墟乙三、乙四、乙五基址研究》等，是关于这个专题的已有成果。

可以看出，我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安阳殷墟和郑州商城展开，重点是关于夏、商文化的讨论。

在我以往的研究中，十分注重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有机融合。看重实证的考古学与论出文献的传统历史学，如能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则大有裨益于其共同的目标。历史学家注意采用考古学材料，已是超越前辈的必由之路，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相比之下，考古学家对于传统文献的重视和利用，似乎有所欠缺。我虽然对此稍有关关注，但相当肤浅，不过是想让自己的研究稍微斑斓一点而已。

回顾自己走过的25年科研之路，我最为感触的是“天道酬勤”：付出一份辛劳，就得到一份收获。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捷径可走。如果说一定要寻找“捷径”的话，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治学，就是到达成功彼岸的最佳方式和途径。“天道酬勤”在农家大门的石匾上常常可见，农家也知道这个道理，信奉这个道理。道理朴素、简单，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另外的信条是，学术研究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从众，不迷信权威，独立思考，从善如流，勇于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错误。但，这是一个追求，而不是现有的成就。

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本凡夫俗子，比不得圣人，故而虽过四十，“百惑”不解；年届半百，“天命”淡知。幸而自己献身考古信念依旧，愿效仿贤达，学而不厌，孜孜以求。告别昨日，面向明天，这就是推出本文集的初衷。

最后要声明一下，书中的50篇文稿，是我20多年间陆续写成的，文中观点均是当

时的见解。而中国考古学在过去的 25 年里，取得长足进展，我本人也得以水涨船高，稍有进步。因此，过去的观点未必皆至今坚持，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不断充实、修正自己的认识，摒弃错误，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所以，判别笔者现行学术观点，请依最新发表的文章为准，说明了这一点，也就免去了逐一声明纠正的麻烦。不过，书中任何观点——不管现在坚持与否，都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i)
夏商周考古学论要	(1)
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	(14)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与研究	(21)
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	(28)
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再认识	(86)
偃师二里头遗址四号宫殿基址研究	(95)
偃师二里头遗址都邑制度研究	(107)
偃师二里头夏都规划探论	(129)
中国龙，华夏魂	(150)
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	(177)
安徽出土两件铜斝的年代及其意义	(185)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188)
广汉三星堆出土商代铜牌浅说	(197)
试论夏文化探索	(199)
关于山西境内夏文化辨析	(217)
夏文化内涵特征疑问	(225)
夏商文化断代新探	(234)
关于南亳说与北亳说的前途问题	(243)
“偃师商城界标说”解析	(246)
夏商分界研究中“都城界定法”的理论与实践	(262)
“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	(300)
“郑亳说”四论据辨析	(311)
郑州南关外下层文化渊源及其相关问题	(323)
郑州南关外中层文化遗存再认识	(332)
偃师商城与太甲桐宫刍议	(346)
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	(354)
试论偃师商城小城的几个问题	(361)
偃师商城年代与分期研究	(369)

偃师商城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421)
偃师商城近年考古工作要览	(423)
偃师商城第八号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	(436)
试论商代早期王宫池苑考古发现	(449)
关于郑州商城始建年代问题	(464)
盘龙城商代宫殿基址讨论	(515)
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	(539)
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与商代燕国	(559)
甲骨文·殷墟·古史观	(567)
殷墟宫殿区建筑布局和性质简论	(572)
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的发掘与研究综述	(577)
殷墟乙一基址及其相关问题	(603)
殷墟乙三、乙四、乙五基址研究	(624)
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	(651)
试论江西商代文化的几个问题	(670)
略论新干商墓玉、铜神像的几个问题	(677)
试论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的玉冠饰	(686)
陶爵研究	(695)
封顶盃研究	(712)
铜爵研究	(747)
附 录：杜金鹏 1984 ~ 2006 年著述存目	(785)
后 记	(790)

夏商周考古学论要

一、学科发展历史与研究成果概述

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夏商周考古学见证了中国考古学自初创到繁荣的整个历史过程，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中国境内由中国学术机构发起、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首项考古发掘，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开始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它既是中国考古学形成阶段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夏商周考古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在1928~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组成“殷墟发掘团”，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成就斐然。就考古发现而言，这15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包括：第一，共获得商代刻辞甲骨24900多片。殷墟发掘的最初目标就是寻求通过科学发掘搜寻殷代甲骨文，从而对甲骨文和殷商史进行科学研究。这些刻辞甲骨不仅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还有清楚的地层关系，并有与其他商代遗迹遗物的共存关系，为甲骨文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天地。第二，在殷墟宫殿区发掘了一批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发掘者认为分属53座建筑），从而揭开了先秦时代帝王宫殿、宗庙等礼制建筑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之序幕。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李济先生评价说：“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工作”。第三，发掘了11座商代晚期王陵和从属于王陵的上千座祭祀坑，这是古代王陵考古发掘的先声。就学科建设而言，这15次发掘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首次把现代考古学田野发掘方法运用到商代考古科研实践中，堪称我国夏商周考古学的开创之举。第二，培养了一批商代考古学者，由此造就了多位蜚声中外的甲骨文学家、商代考古学家，初步奠定了中国夏商周考古学队伍的基础。第三，积累起大量商代考古资料，为迅速切入商代考古学的核心课题，提供了资料准备。第四，以铁的考古学事实，证明我国在商代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打破了当时中外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古史体系的全面否定，使得以“二重证据法”为武器的新史学充满活力，充分显示了考古学的重要性。

在发掘殷墟的同时，还进行了对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的发掘。1933~1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则在陕西渭河流域进行了考古活动，发掘了宝鸡斗鸡台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遗址和周秦汉代墓葬。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也逐步开展。殷墟前7次发掘的成果和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1929年创刊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至第四期上,第8~15次发掘的报告和论文主要发表在1947年创刊的《中国考古学报》第一至第四册,出版的考古学刊物和著作还有《六同别录》、《殷历谱》、《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上辑。宝鸡斗鸡台遗址周秦墓葬资料则结集为《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因此可以说,夏商周考古学是从商周考古起家的,安阳殷墟的发掘则是夏商周考古学的第一块基石。

夏代考古是以夏文化探索为主题的考古学研究。早在20世纪前半叶,我国学者就开始了夏文化的讨论,先后提出了仰韶文化是夏文化、黑陶文化或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假说,还有人根据古代文献的提示,前往山西寻找“夏墟”遗址。而正式地把夏文化探索作为一个明确的学术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展开来,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徐旭生先生率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人员在豫西地区进行的“夏墟”考古调查为开端,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则为其重大成果。在随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方面考古学家在河南、山西开展一系列以夏墟、夏文化为目标的考古调查,分别发现一批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确定了二里头文化之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为夏文化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夏文化探索的重要学术活动分为:第一,大规模、大范围的考古调查。考古学家在史传为夏墟的豫西、晋南地区进行了艰苦的野外踏察,发现数以百计的属于夏代纪年范围内的古遗址。第二,建立了周详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使上述地区自“先夏”时期至商代的文化遗存,连为一条环环相扣的古文化链条,从而把探索夏文化的目标限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于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成为探索夏文化的学者集中关注的目标。第三,发掘了偃师二里头、夏县东下冯、登封王城岗等重要遗址,其中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在夏文化探索方面最具学术价值,它不仅提供了有关夏文化内涵的资料,还为追寻夏代都城遗址给出了明确目标。第四,就夏文化的分布地域、内涵特征、年代范围、类型划分、都城遗墟以及夏商分界,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夏文化讨论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争鸣最为激烈、最为持久的一个专题讨论,影响相当广泛、深远。

纵观夏文化探索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以1959年徐旭生等奔赴豫西调查“夏墟”为界标,此前是夏文化探索的萌芽阶段,此后则进入夏文化探索的初级阶段。在萌芽阶段,学者只是对于已有考古资料与夏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初步的联想和假设,除此之外没有在预设课题指引下有任何田野工作之突破。而在初级阶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寻找夏墟为明确目标的田野工作,得以正式展开。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初步锁定了夏文化探索的大致目标;以1977年登封王城岗现场会为标志,夏文化探索进入快速发展和繁荣阶段。田野工作在河南、山西等地全面展开,夏文化探索成为整个考古学界所瞩目的热点,并形成“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西亳说”和“郑亳说”学者之间

长期的攻守、对峙，为其特别景观；以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为界标，夏文化探索迈进深入讨论阶段。偃师商城的发现为夏文化探索提供了新契机，尤其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重大学术课题推动下，偃师商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进入全新阶段，“西亳说”和“郑亳说”之间的共识迅速提升，夏文化的面目更加清晰，夏文化探索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夏代考古其他方面也有不少进展。首先是各地发现了夏代不同特色的文化遗存，如东方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江汉地区的夏代文化，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北方草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山西汾河流域的光社文化，河北漳河流域的下七垣文化……学者可据以推断出夏王朝时期中国大地上“天下万国”的大致格局。其次是摸清了各地文化的相互关系，由此知道了当时华夏文化大家庭各成员之间的联系。

商代考古起步早，发展快，收获大。建国伊始，新中国考古学者便开展了商代考古活动，这就是对安阳殷墟武官村商代大墓和辉县琉璃阁商代遗址、墓葬的发掘。自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持续在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在宫殿和一般建筑、王室贵族墓葬和平民墓葬、手工业作坊、祭祀坑、车马坑等遗迹的发掘方面，均有重要发现，同时获得大量刻辞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由此学者对于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各方面，有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关于殷墟的布局、内涵、年代、分期、性质等诸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都城考古为核心的商代考古有了坚实基础。

郑州二里冈遗址的发掘和郑州商城以及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使学者得以认识商代前期文化，人们对于商代社会的了解更加全面。由此引发了关于商汤都邑、夏商文化分界等问题的热烈讨论，“郑州商城汤都亳邑说”、“郑州小双桥仲丁隰都说”与“偃师二里头汤都西亳说”、“郑州商城仲丁隰都说”，持不同学说的学者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有力地促进了夏商文化的研究。

偃师商城的发现，不仅为夏商分界提供了绝好的考古学都城界标，把夏文化探索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而且由于偃师商城保存较好，考古发掘面积大，且系统而较全面，因而资料相当完备，对于研究商代都城制度和商代早期社会，意义十分重大。偃师商城的发现和一系列考古发掘，把夏商考古学推进到空前层面。“西亳说”和“郑亳说”的长期辩论，在取得某些共识的基础上，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商代中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个比较模糊的认识。几年前，因为撰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推动，明确提出“中商文化”，并随后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都城遗址“安阳洹北商城”；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需要，学者前往史传“邢墟”的河北邢台调查发掘，在东先贤遗址获得若干中商文化遗存。至此，商文化序列基本完善，商代早、中、晚期都城也连成系列。

商代考古的动力，始终以中原地区都城考古为主体，同时，周边地区的商代考古则使得商代考古更加充实丰满。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山东

益都（今青州市）苏埠屯大墓、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河南罗山后李商代墓葬、鹿邑商周墓葬，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四川成都商代遗址和三星堆商代祭祀坑，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遗址和墓葬、城固商代青铜器群、长武碾子坡和武功郑家坡等遗址，陕晋黄河两岸商代青铜器群，山西垣曲商城，内蒙古伊金霍旗朱开沟遗址等等，证明此时一个庞大的中华青铜文明共同体已经在黄河、长江等流域广阔的土地上形成。

周代考古的早期工作可以甘肃临洮辛店遗址、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为代表。而以都邑考古为核心的周代考古学研究，则初创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西周和东周都城遗址的勘查与发掘。首先，对陕西长安张家坡一带的调查发掘，确认了西周都城丰镐遗址所在，并初步建立了西周文化分期序列，从而奠定了西周考古学基础。此外，经勘查发掘的东周城址有洛阳东周王城、临淄齐国故城、侯马晋国都城、易县燕下都、凤翔秦都雍城、临潼秦栎阳城、新郑郑韩故城等，东周文化面貌初露端倪。

与此同时，周代考古发现还有：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东周墓葬，洛阳中州路东周墓葬，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湖南长沙战国墓；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寿县春秋时期蔡侯墓，江陵望山、沙冢战国楚墓；山西侯马上马晋国墓地；山东临淄春秋齐国大墓；安徽屯溪西周贵族墓葬“土墩墓”；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等商周遗址和墓葬等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周代考古全面开花。主要考古发现包括：河南洛阳西周墓，三门峡西周虢国墓葬，平顶山应国墓葬，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温县春秋盟誓遗址，淮阳战国楚墓；陕西扶风、岐山的西周都城周原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刻辞甲骨、墓葬、车马坑和青铜器窖藏等，长安沣西西周夯土建筑基址和“井叔墓”等墓葬，宝鸡西周獯国墓葬，咸阳秦咸阳故城，凤翔春秋秦公陵园；河北邢台西周邢侯墓，邯郸赵国故城，平山中山灵寿城与中山王墓；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临淄商王村、相家战国墓葬，临淄后李战国车马坑，章丘女郎山战国墓，长清仙人台峙国墓，临沂凤凰岭东周墓；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城址和燕侯墓等墓葬，昌平白浮西周墓葬，延庆春秋戎狄墓；山西侯马晋侯墓，侯马东周铸铜遗址，太原金胜村春秋贵族墓；湖北荆州楚都纪南城，江陵雨台山、七星观、马山、九店楚墓，荆山包山楚墓，随州擂鼓墩战国曾侯乙墓，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湖南长沙、临澧楚墓；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葬；四川新都战国蜀王陵；江苏丹徒春秋墓；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吉林永吉西团山文化墓葬；辽宁二道河子石棺墓，朝阳魏营子文化遗址和墓葬；甘肃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江苏苏州真山大墓；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等等。

二、当前学科前沿与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近年来，夏商周考古学科中重大研究项目有二：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二是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的编撰。

“夏商周断代工程”属于国家“九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96年5月启动，2000年基本结束。设有“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夏商周天文学综合问题研究”、“夏代年代学的研究”、“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9个课题，下分44个研究专题，其中属于夏商周考古学范畴的有：“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郑州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周原甲骨的整理及年代测定”、“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晋侯苏钟专题研究”、“西周金文历谱再研究”等。参与工程的专家学者有200多人，分属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学科。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工程取得较大成功，预设学术目标基本达到：建立了夏商周年代框架，对商王武丁至帝辛诸王、西周武王至厉王，给出了具体年代，从而制订了新的夏商周年代表。就夏商周考古学科建设而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大贡献在于：促进了相关遗址的发掘，推动了田野考古工作；多学科联合工作，促进了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拓宽了学科界面；推进了关键问题讨论，缩小了学术分歧；扩大了夏商周考古学的社会影响。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与《中国考古学·两周卷》，是全面总结夏商周考古学的现有成果、阐述作者对于夏商周考古学的认识之学术专著，属国家社科重点项目。1996年立项以来，有关学者对于夏商周考古学进行了全面思考、梳理。其中“夏商卷”已于2003年、“两周卷”已于2004年相继出版。这是两部全面论述夏商周考古学的专门著作。

近年夏商周考古学田野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国家重点科研课题而展开的考古调查、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一些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根据新的学术课题要求进行。

围绕早期夏文化探索，重新发掘了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新密新砦遗址，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有了一些新认识，对于新砦文化内涵特征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其文化性质在大多数学者间取得了共识；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围绕年代学的发掘找到了一至四期文化遗存的直接地层叠压关系，通过对新出土含炭标本的科学测定，给出了二里头文化系列碳-14年代数据。围绕宫殿区布局和宫殿建筑基址的勘探发掘，基本划定了宫殿区的范围，找到了宫城城墙，揭露出二期、三期、四期的宫殿基址，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之性质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在偃师商城，小城城垣的发现、宫城

内多座宫殿基址的发掘、宫城北部祭祀遗存和池渠遗存的发掘，不仅在商代考古学上属于空前发现，而且对于整个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也意义重大。大城、小城、宫城城墙和宫殿建筑、水池、祭祀遗存之年代的逐一确定，文化分期的最新研究，铸铜遗迹遗物的发现，使得人们对于偃师商城的布局、内涵、年代、分期、性质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偃师商城为夏商界标说”得到学术界基本公认，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夏文化研究。在郑州商城，对于宫殿区部分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把郑州商城夯土建筑的建造年代推前，为加强“郑亳说”提供了新材料。在郑州小双桥遗址，众多祭祀遗迹和夯土建筑基址的发现，证明它与商代都城有关，由此产生了“小双桥仲丁傲都说”，在学术界引起关注。洹北商城的发现，不仅充实了商代都城遗址序列，完善了商文化系列，使得学者探讨“河亶甲迁相”、“盘庚迁殷”又有了具体对象，在中商文化研究方面确属重大突破，而且对于安阳殷墟的再认识，也非常重要。发掘出的一号宫殿基址，属于现知规模最大的先秦宫殿基址，其布局结构对于先秦宫殿制度研究，相当重要。新发现的安阳殷墟 M54 贵族墓葬，是继小屯 M5 “妇好墓”、郭家庄 M160 高级贵族墓之后，在殷墟发掘的第三座未被盗掘的高级贵族墓，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在长安沔西遗址，首次成功找到了先周文化与西周早期文化遗存之间直接的地层叠压关系，为其年代测定提供了考古学地层依据和合适标本。在曲沃西周、春秋晋国墓地，晋侯和夫人墓的发掘，既为晋国史研究提供了可靠材料，又为西周王年排列提供了可信依据。在关中周原遗址，新揭露出西周宗庙建筑基址，发现了手工业作坊遗迹，这是西周考古方面的重大成果。在北京琉璃河西周城址，发现了带有“成周”刻辞的西周甲骨，为城址年代、周初分封研究，贡献了新资料。

此外，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如四川成都商代遗址的发掘，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的发掘……兹不一一列举。

回顾夏商周考古学 70 多年的学科建设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为学科初创期，主要指 20 世纪 20 ~ 40 年代，商代考古一枝独秀，夏代和周代考古尚未成形。二是基础建设期，即 20 世纪 50 ~ 70 年代前期，以资料积累、学科框架搭构为要务，在大量考古勘查和发掘的基础上，基本完成了建立夏商周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文化类型划分与年代分期任务，夏商周考古在全国全面铺开。三是学科发展期，指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前期，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年代、分期等基础课题更臻完善，考古学理论建设和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备受重视。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持不同学术见解的学者之间展开了持久而热烈的辩论。夏商周考古学成为中国考古学中最具学术活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学科之一。四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叶以来，受“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力推动，夏商周考古学又有一次全国性动员，以建立夏商周年表为主要目的和标志性成果、多学科联合攻关行动，不仅推动了田野考古的前进，有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也促成了研究工作方面的新突破，学术界在一些原先争论已久的问题上，多有共识。